

绥远方式的胜利

SUIYUANFANGSHIDESHENG LI

裴周玉

山西人民出版社

•9

K266.9

3-2

8578/02

绥远方式的胜利

裴周玉 山西人民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绥远方式的胜利

裴周玉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字数: 99千字
1989年12月第2版 1990年4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 2,901—5161册

*

ISBN 7—203—01443—6
D·124 定价: 3.30 元

前 言

在富于神话色彩的蒙古族牧民中有一个美好的传说：说是上帝在大青山深处藏有一把金钥匙，谁有了金钥匙，谁就能打开古老的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的城门。三十五年前，毛主席找到了金钥匙，这就是“绥远方式”。

毛主席首创“绥远方式”，用“绥远方式”这把金钥匙打开了和平解放绥远的大门。“绥远方式”使一百二十万绥远人民得到了解放，使身处绝境、四面楚歌号称十万的国民党绥远部队和党政人员获得了新生，使具有悠久历史的塞外文化名城归绥免遭战火。同时更重要的是为全国即将解放的国民党占领区域残余部队树立了榜样……毛主席首创的“绥远方式”，是一座不仅矗立在绥远大地，而且矗立在整个中华民族心头的历史丰碑。横的看，蜚声中外；纵的看，名垂千古。

当年，在国民党绥远部队中，有些人对我们党的“既往不咎，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各安其业”的政策不相信，不理解，认为是权宜之计，说什么共产党的惯用手法是先甜后辣。三十五年过去了，时间老人是最公正的，我们对起义人员起义前的历史问题“咎”了没有呢？无可讳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其间，林彪、“四人帮”“咎”了；但他们

不能代表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按照既往不咎的政策，凡是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历史问题“咎”了的都落实政策，给予平反。

对于起义有功人员，共产党一直是不忘其功的。党中央决定，从一九八四年清明节起将傅作义将军的骨灰盒供奉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其他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骨灰盒放在一个瞻仰厅里，供群众瞻仰，让全国人民永远记住，傅作义将军当年交出北京城和领导绥远起义的历史功绩。董其武将军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共主国家大事，且在八十多岁高龄，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起义过程中持迟疑观望态度、在起义通电上最后一个签字的孙兰峰将军，起义后，就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蒙绥合并后，又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此外，还是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起义三十年来，一贯受到共产党、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内蒙古党委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

这里说一段小插曲：周总理生前曾把宋庆龄赠送给他的半瓶法国名酒用来招待傅作义、孙兰峰将军，而这酒又是法国友人赠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可见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起义将领的敬重非同一般。绥远起义干部中，很多人得到了重用，仅分配到山西省担任厅局一级干部和参事室参事的就有十八人，分配到各业务部门担任中层干部的有二十余人。现在，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保定都妥善地安置了一批年老的绥远起义干部，他们在那里和家人团聚，欢

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有这么一段故事，起义前夕，原国民党第三十二兵站少将分监马良弼向该部上校参谋长王度表示：“宁跳黄河，也不跟共产党。”王度针锋相对地表示：“宁跟共产党走，也不跳黄河。”结果马良弼乘飞机去兰州，途中飞机失事毙命；王度参加起义，走向新生，现在是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两条道路，两种选择，两种结果。

“绥远方式”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双方都不诉诸武力，而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和平解放的先例。它虽已过去三十六年，但许多方针政策和经验教训，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所以大胆写出供读者指教。这是我写此书的主要目的。

裴周玉

一九八五年三月

薄一波同志给作者的一封信

裴周玉同志：

你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信及“绥远方式”五篇回忆录收到后，我一直没有时间翻阅，直至最近才粗粗地读了一遍。解放战争期间创造的“绥远和平起义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解决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的三大方式（三种方式）之一，不可没有一个记载，你和高克林同志共商，由你执笔回忆写书，这是件大好事。我除将你的回忆录交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外，特向你表示祝贺！并建议继续收集材料，加以充实完善。

薄一波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目 录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	(1)
第二章	绥远和平协议的签订·····	(23)
第三章	绥远当局的光荣选择·····	(45)
第四章	绥远军队进入解放军行列·····	(78)
第五章	军队出现崭新面貌·····	(97)
第六章	抗美援朝的战火考验·····	(116)
第七章	向国防现代化进军·····	(134)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

绥远（现内蒙古西部地区）是我国蒙古族聚居的主要区域；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是华北的重要战略地区之一。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政府，都极为重视抢夺控制这块宝地。早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中，就提出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何梅协定”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归绥（现呼和浩特市）设立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特务，收集情报，收买蒙旗的王公贵族、瓦解分裂蒙汉人民的团结。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光景，绥远地区的主要城镇和平绥铁路相继沦陷。从此，日本侵略者，以归绥、包头为统治中心，大力扶持蒙奸德王等人的伪蒙疆政权，并进一步诱降西部的内蒙古上层王公贵族。日寇还极力从政治上挑拨破坏蒙汉族关系，妄想分化瓦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行其“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还派出中央军何文鼎等部及西北的邓宝珊二二军支援绥远“反共戡乱”，企图全部夺取控制绥远与华北。

我党在绥远坚持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战胜了各种困难，取得了绥远人民特别是蒙民的支持拥护，在全国解放战

争的大好形势下，北平和平解放后，党对绥远地区号称十万的国民党大军，没有采用军事进攻的方式而采用了和平谈判的“绥远方式”，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毛泽东选集》第1362页）绥远问题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经我们与傅作义、董其武将军的共同努力，终于举行了起义，脱离了南京政府，和平解放了绥远。正如董其武将军在“绥远起义”三十一年后所说的：“绥远起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政策的胜利。

一、“绥远方式”的提出

一九四九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敌我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蒋介石只剩下残存的一百多万军队，再也无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但要统一全中国，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付出一定的代价。为此，在继续发扬我军英勇善战，勇往直前战斗精神的基础上，要发挥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以便以更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尽快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

“绥远方式”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傅作义将军交出北平，为人民做出了贡献，而绥远又是傅将军的后方基地，他完全有可能有力量控制与解决绥远问题，因此从解放全中国出发，具体地分析了绥远的敌我形势后提出的。

一九二八年，傅作义将军（字宜生）担任天津警备司

令，后来任绥远省主席兼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对日本《何梅协定》就极为不满。条款中规定允许日本在绥远派驻特务机关，傅作义将军更感不安，极表愤怒。日本羽山喜郎（特务机关长）向傅将军提出的取消归绥“九·一八”纪念堂和长城抗日阵亡将士烈士公墓的题署，在归绥挂出日本特务机关——羽山公馆的牌子，在绥远公开进行特务活动，参观傅的部队，在包归机场增修机库等要求，都引起傅作义的极大不满。日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曾突然飞绥同傅将军会晤。坂垣说：“中日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应该互相亲善，不应该互相仇视，影响邦交。”傅说：“……‘亲善’作幌子，迫使一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根本就谈不上互相亲善。”坂垣还提出华北与绥远的问题，都被傅作义将军断然拒绝。傅作义将军在日军侵略威胁下，于一九三六年冬，对日本支持、训练与指挥的伪蒙古军及汉奸武装王英部发动了有名的百灵庙即绥东抗战，打破了日寇侵略绥远的美梦，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并得到了我党的赞助。当时毛主席从陕北给傅作义将军发了电报祝贺百灵庙大捷，派南汉宸同志携慰劳款和锦旗，参加百灵庙祝捷大会，并推动全国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掀起了捐款祝捷慰劳热潮。音乐家吕骥同志亲自到祝捷大会上教唱救亡歌曲。“七·七”抗战爆发后，傅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抗战和忻口、太原战役，在绥远后套坚持了抗战，打击了日军的侵略。他为坚持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日本投降后，傅作义将军对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产生的和平建国纲领，是拥护的。在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也执行了蒋介石的“反共戡乱”政策，但傅先生交出了驻北平的二十五万军队及历史悠久的

古都北平，功劳是卓著的。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同共产党有过一段合作历史，一九三八年延安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在傅部队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傅先生的支持和保护，蒋介石反共高潮时，傅先生将这批人员送回延安，更是难能可贵的。正如董其武将军所说：“傅作义部队和当时中共所属八路军曾经是在一条战线上抗日的战友。一九三八年在中共的发动下，贺龙师长为傅将军部补充了三千名士兵，增强了傅部的抗战力量，延安曾派多批干部参加傅部各级部队作政治工作和抗日动员工作”。

绥远是傅将军苦心经营十几年，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基地，也是他发家致富的发祥地。傅作义虽然离开绥远好几年，但绥远军队高中级将领中多是跟随傅多年的人。其中有一批将领是张家口解放后被我俘虏释放回去及北平解放后傅先生派回去协助董其武将军进行和平工作的，所以绥远局势即使非常复杂，派系斗争激烈，反对和平的势力强大，傅先生还是可以控制局势的。正如现全国政协常委、内蒙政协副主席孙兰峰先生所说：只有傅先生来绥，才能解决绥远问题。因此，解决绥远问题的关键人物，仍然是傅先生。

国民党华北“剿总”驻归绥（现呼和浩特市）指挥所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绥远保安司令董其武将军则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将军是一位饱经世故，没有完全沾染国民党军队恶习的正直将领。他不是富家纨绔子弟，更不是蒋介石的亲信。董其武自一九二四年投入国民军，历任排、连、营、团长，一九二八年就投入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部下，任参谋、团长。一九三六年升任二一八旅旅长，并被任命为绥东防守副总指挥，于一九三六年冬率部参加百灵庙战役（又称绥东战

役)中的红格尔图(陶林县东)的抗战。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击溃了敌人的进攻,保证了百灵庙战役的胜利,“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董其武先生随同傅将军率部参加察哈尔抗战,收复了商都县城。尔后,他参加了残酷的忻口与太原防守战役,曾给进攻之敌严重挫伤,被提升为一〇一师师长(下辖两个旅)。一九三九年冬奇袭包头市日本侵略军时,经过激烈巷战,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反动气焰。一九四〇年初,日寇进攻后套时,他率部进行了坚决抵抗,打乱了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部署。傅部在五原进行反攻时,他还率部奇袭与堵击敌人的援军,经过激战,迟滞与阻止了日军的增援,保障了五原战役的胜利,为此,董被晋升为军长。日本投降后又晋升为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绥远省主席兼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是傅作义将军手下的一名得力助手,对傅作义将军言听计从,忠贞不贰。这里说一件小事:董其武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卧室内,只挂傅作义将军的巨幅照片而不挂蒋介石的像。傅将军也视董为心腹,他们的关系过从甚密。五原大捷后,一九四〇年秋,董其武以暂四军军长的身份应召去重庆报告五原大捷的情况,第一次见到国民军何应钦总长时,何说:你们五原战役打得很好,你们武器不够好,可以给你们补充大部分。董其武要回前线向何辞行时,何说:“现在国家困难,武器只能给你们补充一部分。”当即亲自交给董其武一个领武器的凭证。董其武一看,仅仅是轻机枪二十七挺,步枪三百支。董很难过,他反复思考,所谓“大部分”就是机枪二十七挺,步枪三百支吗?这大概是因为董部只打日本不打共产党吧?和他住在同一个招待所的胡宗南所属的十六军军长董剑,拿出领

武器的凭单给董看，该军的武器全部都更换了。这种厚此薄彼的对待，使董非常愤怒。一九四三年，董其武从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结业后回到绥远时，傅将军问他学习有何心得与收获。董其武说：当然，战略战术等方面讲得不少，可是我得到的反面教育也真不少。傅问：这是为什么？董说：“我对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种种情况实在看不惯。前方炮火连天，浴血奋战，而在后方看到的是：头面人物，花天酒地，骄奢淫逸，在政治上，党派分歧，门户林立，尔虞我诈，互相倾轧。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领能不能担负抗日救国的责任，我抱很大怀疑，甚至失望。”傅将军默默不语。

董其武从营、团长提升为师、军长，都是傅将军一手提拔的。他在傅将军麾下供职多年，一贯肝胆相照，对傅将军有深厚的感情。董将军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对蒋介石排除异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一直不满，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极表关注。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下，他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小心谨慎地考虑绥远的前途问题。他曾设想，一种是同共产党对抗到底，必定断送一切，绥远人民也会遭受很多灾难，自己也会身败名裂；一种是带领部队西逃宁夏或青海，最后必以失败而告终；再一种是走人民的道路，得到共产党的谅解，前途光明。象他这样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谨慎考虑各种前途，征询亲信的意见，是一种正常现象。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他从广播中听到北平解放的消息后，对傅将军选择人民的道路极表同情，但也忧心忡忡，疑虑不安，“绥远该如何办呢？”于是，他于第二天上午乘专机到北平向傅作义将军请示绥远问题事宜。在中南海居仁堂，傅将军同他畅谈自己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交出北平的

决心时说，他与反对和平者进行了坚决斗争，甚至准备着三死：被不明大义、不了解实情的人打死；被军统特务打死；被不明真相的一些共产党人按战犯处死。傅还谈到：“蒋介石曾慌忙飞北平策划要我出兵援助锦州被拒绝；沈阳战役紧张时，南京令我参加高级军事会议，在会中蒋介石以擢升我为东南军政长官，国民党所有部队归我指挥为诱饵，逼我将华北部队南撤。当时我断然表示：一、华北局势不象一般人看的那样悲观失望；二、对扭转华北局势还有办法；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因此，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教训值得考虑。”这是傅作义将军的金蝉脱壳之计。蒋介石反很赞赏傅作义将军这种临危不乱，全局在胸的大将风度，放心地让傅从南京迅速回到北平。这个金蝉脱壳之计，为他从容安排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傅将军向董说：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要我率部南撤，又派军统二厅厅长郑介民来平劝傅，保证军统人员先撤，蒋又派其子蒋纬国携他的亲笔信来平，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并令傅接受所谓西安事变的教训，最后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来北平，对傅表示，今后美国要抛开蒋介石，直接支持傅，美海军将在沿海援助南撤等。所有这些劝说阴谋都被傅将军婉言谢绝或坚决抵制了。最后傅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最后，他要求董其武将军回绥远“安定部队情绪，稳定绥远局势，要走人民的道路。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从此，董将军逐渐明确和坚定了走人民道路的决心。他从北平回归绥后，就开始在高级军政人员中进

行试探性的谈话，介绍了面谒傅先生所得到的启示，要求军官们注意形势的发展，绥远问题等傅先生佳音，并广泛征询各界首脑对绥远应走什么道路的意见。通过这些上层活动，既传达了傅先生的意见，介绍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形势，又听取了大家的反对意见与不同看法。从谈话中，他看到少数人仍持怀疑态度，认为目前局势胜负未定，步子不宜过快，决策不宜过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可能没有排除。少数人听了传达后还怒气冲冲地说：“不能跪下向共产党投降，不到你死我活，山穷水尽时，不能选择和平道路”。“凭自己的一条老命，也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因此绥远问题，既不能很快解决，和谈也不会决裂，既要允许傅先生与董其武先生做好持不同意见的将领的工作，又要等待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样绥远问题才能妥善解决。

绥远起义军队，根据一九四九年底绥远董军指挥所的统计是：九万二千零二十三人（不含家属小孩和北平遣送回绥远的一万二千军官）。这九万余人中，包括八个师、八个旅、三个警备区与地方保安团队、蒙古族各王府的武装等。这些部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成份各异，思想混乱，但十六个师旅中，大多数是董将军的亲信或得力军官所控制指挥的，能够听从指挥调遣。其中独立第七师人数较足、武器较好，又是董军的一张王牌，这是绥远能够完成整体起义的关键所在。少数领导人，思想上跟不上形势，各种顾虑较多，甚至反对起义，是组织起义的一大阻碍；再次，尚有一万二千军官是北平和平解放整编时，不愿留解放军工作的军官，我方发给路费，允许与护送他们回到了绥远，这些人员

多数被董方收留分配了工作，其中许多人回到部队工作，除少数不同意起义外，多数是积极支持起义的。所以绥远起义的关键是军队，而军队的关键又是能够听从董将军调遣指挥的这些主要将领，否则绥远就不能达到完整起义之目的。

由于绥远军队内部派系复杂，董其武将军又受到某些观望和平与反对和平者的包围和威胁，解放大军还未打过长江去，所以不少人，要完全克服幻想，消除顾虑，决心走人民的道路，还是不容易的，有时发生动摇犹豫，也是不足为奇的。有的提出绥远前途是“和、拖、走、打”，但主张打和走的人属少数，“打”就等于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走”的道路，宁夏解放后也已断绝；剩下的就是“和”与“拖”。其中主张“拖”的人，想用“拖”的办法，观望世界与国内动向，以便自己有机会和时间选择道路。不少人认为“拖”是上策，不到山穷水尽时不走和平道路。因此，解决绥远问题就不能要求过急过快，否则“欲速不达”，事倍功半，甚至还会造成一时的混乱局面，增加人民的痛苦。

绥远方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二、革命之火，源远流长

我党历来对绥远的工作非常重视，并在绥远的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和很深的影响。绥远的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抗战后，我党我军建立了大片根据地与解放区。这是我党正确解决绥远问题的重要基础与条件之一。

从一九二四年起，我党就有一批共产党员——乌兰夫、奎璧等同志在这个地区开展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王若飞同